

学者面对面

前进、生存和繁荣

——彭林教授谈以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本报记者 王小宁

编者按: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同文明之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将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

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指引。本期学术周刊专访日前参加了“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彭林，请他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深入阐释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意义。



彭林

各国汉学家对“礼乐文明”的发言报以热烈掌声

文化周刊：彭老师，在不久前召开的“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小组讨论会上，您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各国学者的强烈共鸣，通过新华社的短视频发布后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认同。您能否为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情景和发言内容？

彭林：这次会议规模很大，有70多个国家的汉学家到会，做文明交流互鉴的对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飞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中国文化是怎样的文化？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处事原则是什么？将来是否会由强而霸？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发言的题目是：《礼乐文明与儒家的和平发展之道》，试图从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视野，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与思想世界的角度，为各国汉学家提供自己的解读。

中国人的民族性，植根于农耕时代。农业社会，生活安定，温饱问题比较容易解决。《孟子·梁惠王上》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一块土地需要耕作三年以上才能成为熟土，所以农民依恋土地，不愿离乡背井，这是农耕民族的基本特点。

据《史记》记载，周人原本与西北方的游牧民族杂处（秦汉时称匈奴）等杂居，因一再受到胁迫，而屡屡以退让、迁徙换取和平。《诗·小雅·采芣》说：“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遘启居，玁狁之故。”正是周人厌恶战争、向往和平的生动流露。中华数千年历史，从无向外寻衅挑战的记载，从根本上说，正是农耕民族的民族性所致。

此外，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亦无好战的基因。周公制礼作乐，推行德治，民本主义思潮勃兴。从孔子到孙中山，中国人一以贯之地将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作为终极的理想目标，而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通向这一境界的四个阶梯。儒家文化聚焦于人的道德成长，《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以礼修身，以乐修心，内外兼修，成就自己的君子风范，成为中国人的人生理想。在社会治理中，以道德立国，《大学》说，“君子先慎乎

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坚信道德高尚者，必定得众（有人），得众者必定得国（有土），财用充足。《孟子》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义必胜，成为中国人的坚定信念。在儒家的理论框架内，挑动战争、胁迫他国的执念绝无存在的空间。

在座的汉学家以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表示赞同我的发言。茶歇时，许多汉学家过来与我交谈、加微信，还有人表示要译介我的著作。



《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彭林 著

以文明交流互鉴,重建人类文明多元化格局

文化周刊：“文明交流互鉴”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关键议题，您认为我们应如何认识其重要意义？

彭林：毋庸置疑，人类文明是多元的。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活习俗等的差异，区域文明的样态必然各不相同，它们按照各自的节奏与逻辑，自由地发展、成长，是各民族人民的正当权利。西方殖民运动兴起后，原本多头并进的区域文明的进程被粗暴打断，殖民者力图将其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变成自己经济上、政治上的附庸。随之而起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将人类文明说成是一元的（黑格尔就说是按照单一的时间线索发展的）。一些西方人认为，世界历史只有一个坐标轴，他们居于这一坐标的高端，其他民族都处于低端，甚至落后了整整一个历史阶段。因此，一些西方人的今天就是其他民族的明天，世界的现代化就是西

化。在此理论之下，西方人是创造文明的民族，其他则是只会消费西方文明的劣等民族，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对话互鉴的可能。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不少第三世界国家放弃自己故有的本位文化，日渐走向西化。这种现象严重破坏了人类多元文明的生态，许多民族的文化迅速消亡，引起各国知识分子之忧虑。

我们应该看到，美国在推行军事、经济霸权主义的同时，也在全球强势推行其文化霸权主义。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以“铁罐”撞“陶罐”之势冲击西欧电影市场，法国电影市场的60%被美国占据，在某些国家则高达80%-90%，不仅本土市场严重萎缩，国民价值观亦随之悄然改变，景况堪虞。其后，在美、法关于关贸总协定的开放服务市场的谈判中，美国强调影视产品的商品属性，而法国则强调它有精神与价值层面的内涵，并非普通商品，把文化的单一化和文化产品的标准化作为文化多样性的敌人来加以反对。

文化的全球化将加速异质文明消亡的现象，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警惕。200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当今的文化传播正在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为此，“必须扶持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让他们与外国文化并驾齐驱。”各民族的文明都有合理性，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理应享有同等的尊严，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文明之间交流对话平台的构建，使任何民族都可以有尊严地向其他民族与国家宣介自己的文化传统，包括生活方式、文化个性与价值观，同时在交流互鉴中学习以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为本国、本民族的发展规划更加合理的路径。事实证明，不打破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消极影响，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就不能真正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因而，文明交流互鉴对于重建人类文明多元化的格局具有战略意义。

文化周刊：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文明之间的对话从未停止。人类文明彼此依存，通过交流互鉴不断进步，走到今天，我们知道“一带一路”就是这样一切实证。您能否为我们具体加以阐释。

彭林：人类具有群体性。在原始社会，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人类依靠群体的力量而得以生存至今。群体性的表现是分工合作，社会越发展，学科的树越分枝，社会分工越细密，时至今日，即使是一台手机，都需要数百家工厂的合作才能完成。

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不同文明之间并非只有排斥与对抗，完全可以兼容并蓄、相得益彰。《尚书》说，舜的乐官夔，能使“八音克谐”；商汤的宰辅伊尹用“和五味”的道理说服君王兼收并蓄。不同特点的事物，可以彼此呼应、和谐共处，儒家“和而不同”的理念，显示了儒家吞吐百家的气象。

交流互鉴才能更好地前进、生存和繁荣。每个国家的资源都有限，故需要互通有无；再优秀的民族，思想与思维模式都会有偏颇。谁都不能一手遮天，谁也不应作茧自缚。国家的发展，需要吸收他人的优秀，需要源头活水。中国人自古就有博采众长的理念，《左传》明确反对“以水济水”的做法，往水里加水，是在既有层面上简单重复，不可能有质的飞跃。中华民族自古就是在不断的交流与汇通

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即就商代而言，占卜用的龟甲中，就有马来龟；作为货币使用的贝，也多来自马来地区；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具有巴比伦文化色彩。可见商朝与周边的交往始终是畅通的。汉唐以下，更毋庸论矣。全人类都在交往与沟通中获益，今后只会继续扩大，而永远不会中断。

深入研究文化的独特性,坚定文化自信自强

文化周刊：您认为中华文明在今天的文明交流互鉴中应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

彭林：中国学者的责任，不是为证明西方文化的唯一正确再增加一个案例，而是要深入发掘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去与西方学者平等对话。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瑰宝，有许多独特的经验可以供给域外参考。黑格尔将人类历史的发展归纳为七个阶段，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经历过全部阶段的国家，其独特性举世无双。中国人是以文化而不是宗教作为信仰的国度，这在世界上也很罕见。中国又是人类社会独一无二的，将道德教化融入包括典章制度、行为规范等在内的礼乐制度之中，用温和的方式引导民众向上、推动社会进步的国家。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以前，西方学者撰写的世界历史，是将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这是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中国人有太多的话要对世界讲，我们可讲的东西实在太多、太精彩。但这绝对不是可以说以张嘴就来、一蹴而就、不需要准备的，这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工作。

文明交流互鉴，每年开一次讨论会是不够的，而是一项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我认为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深入清理与研究。近百年以来，我们也做了很多否定传统文化的事情，可以说发现自身亮点的工作还只是刚刚开始，许多真正的好东西还在沉睡，亟待唤醒。这是一个文化向纵深方向拓展的过程，要不断刷新，千万不可总是拿那些人人耳熟能详的材料反复炒作。新冠疫情前，我到瑞士洛桑参加一个非遗学术会议，介绍中国古代的“乡射礼”，典雅而人文，与会者闻所未闻，在对此表示惊讶之余，有些学者甚至表示不相信！类似的东西，我们还有不少；二是要把学者研究、整理的成果，通过切实有效的途径诉诸民众，成为全社会的思想资源。只有我们用中华文明成功解决了自身的一些难题，我们才更有与人交流互鉴的底气；三是对外交流的专家队伍要精心挑选、认真组织，理论问题要有研究、有针对性，不可随意拼凑，随性发言。从这些年的相关会议情况来看，这方面问题还有不少。

文化周刊：您认为今天我们如何做到文化自信自强？

彭林：文化自信自强，核心是民众对本国的文化要有深入的了解，并为之自豪，如钱穆先生所说，对其怀有“温情与敬意”。我们如今的问题是，文化的教育往往做得不深不实，甚至流于形式，敷衍上级。特别是缺乏成体系的、学术水平高的、可行之久的文化教材。

我在大学工作数十年，对上述问题有很深的体会。我曾以十年之力，为清华大学学生打造一门名为《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的全校公选课，以农业、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方式，分纺织、彩陶、玉器、青铜器、冶金、造船、建筑等15个专题，介绍我国在这些领域的杰出成就，不意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不少学生反馈，终于触摸到了有血有肉、令人心动不已的珍贵文物，对祖国文化充满自信与自豪。2013年，该课程成为我国首批加盟哈佛大学全球网络公开课平台(edx)的八门课程之一，面向全世界播出，众多欧洲听众的反馈也出乎意料的积极。在类似方向上打造高品质的教材，空间相当大。

希望政府部门能从文化战略的高度，进一步整合全国教师力量，全面规划，打造出文化教育的精品教材，认真实施，必见成效。

学者说话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甲骨文，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成熟汉字系统。殷墟，则被视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点。殷墟及所出土的甲骨文把中国信史向前推进了约1000年，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宝贵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一曼曾两度参与殷墟甲骨文重要发现，认为通过甲骨文或者商代铜器铭文的细心分析、研究、考定，对考古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独特地位。

刘一曼

甲骨文的发现开启了中国学术机构进行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为了寻找甲骨文，1928年秋我国学者对殷墟进行发掘。殷墟发掘是第一个由中国学术机构所领导的发掘，也是我国考古工作者第一次对一个古代都城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科学的考古发掘也为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提供了契机。

1936年YH127坑、1973年小屯南地、1991年花园庄东地甲骨文的发掘，被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次重要发现。回顾120年甲骨文的发现历史、发掘过程和研究成果，我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次重要的甲骨文发掘参与者或主持者，可谓感慨万千。甲骨宝库的神秘大门，在考古发掘中徐徐开启。甲骨资料的层层积累，发掘经验的逐步提高，研究成果的渐次丰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五光十色的甲骨文世界。

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促进了考古学，尤其是殷墟考古学的发展。其一，它使中国的考古发掘走上了科学的轨道。从1928年至193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对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收获巨大。其中1931年梁思永领导的第四次殷墟发掘，在殷墟后岗遗址发现了小屯、龙山和仰韶文化的三层堆积，使学术界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这两种主要文化的早晚关系及它们与商文化的关系有了明确认识，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后岗的发掘，梁思永把他在美国哈佛大学考古系和古人类学系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发掘中去，结束了过去以人为的水平层位，即通过量发掘的深度来登记出土文物的不科学做法，开辟了以文化层为单位的发掘方法，使中国田野考古学走上了科学的轨道，这可以说是我国田野考古史上一次巨大进步、巨大飞跃。殷墟考古取得的成绩，推动了国内其他遗址考古工作的开展。

其二，甲骨文资料为考定殷墟文化分期的绝对年代提供了依据。众所周知，殷墟是盘庚迁殷以后的都城，在这里一共延续了273年（有的学者说是254年）。考古工作者依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陶器的形态变化，将殷墟文化分成四期，确定了它的相对早晚关系，但是它的绝对年代是要依据甲骨文和商代铜器铭文来考定的。经过学者考订，第一期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和武丁早期，第二期相当于武丁晚期、祖庚、祖甲时期，第三期相当于康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第四期相当于帝乙、帝辛时期。

其三，甲骨文资料为研究遗址现象和考定遗址的年代提供了依据。下面我举两个例子。例一，分析甲骨文及商代铜器铭文的“车”字的形体，对殷墟车马坑的发掘和车辆遗迹的研究非常有启迪。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清理出两辆完整的商代马车。车辆的构造是一轴、一舆、一衡、一轭，和甲骨文、商代铜器铭文的“车”字结构很相似。这就表明3000多年前的殷人是将现实生活中的马车为蓝本而创造出“车”字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深入研究了甲骨文中的各种“车”字，不断改进发掘工作，继续探求商代车的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谈甲骨文的发现对考古工作的意义

刘一曼

细节结构，从而取得了许多收获。具体说，第一就是我们对于车衡的认识。在1987年以前，由于殷墟发掘所见的车辆，都是直衡的车，有学者认为商代马车大概都是直衡的。但在商代甲骨文或者铜器铭文里，直衡的车占了绝大多数，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商代应该有曲衡的马车。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在发掘中细心寻找，如果不带着问题是很难找到的，因为是在土中找土、灰中找灰，当时的车都腐烂到泥土里头了，特别是烂到灰土里的找起来就更困难了。1987年，我们终于在郭家庄发现了第一辆曲衡马车，后来也陆续在殷墟其他地点发现了好几辆这样的车子，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关于车轭问题。虽然商代铜器铭文“车”字中见到有车轭，但是以前一直没发现到，所以很多学者认为西周才出现车轭。既然商代铜器铭文有这个图像，我们觉得它应该是有所依据的。所以在发掘中就特别细心地注意清理，终于在1992年发现了第一条车轭，此后也陆续发现了几条。

关于车厢，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安阳考古工作清理的车马坑，车厢都是长方形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商代马车的车厢都是长方形的，但是，由于金文当中有圆形或椭圆形的车厢，它也应该有所本的，所以我们也注意寻找车厢的样子，终于在1992年清理出一个椭圆形的车厢。

此外，在《甲骨文合集》中，有两条十分有趣的卜辞，它记载了商王去打猎时，车轭、车轴都发生断裂，车上的人摔下来了。很有意思的是，我在刘家庄北进行发掘时，在一座车马坑里，发现了两辆车，一辆是好车，另一辆是残破的车，车轭断了，车轴断了，车厢也被压扁了，就这么一辆破车，还埋葬在坑里头，说明当时商代的人造车不容易，车坏了，还留起来用于殉葬。

甲骨文是汉字的鼻祖，它经历了几千年岁月洗礼演变成独特的方块汉字。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有了它，我们浩繁的史料和典籍，民族的记忆才得以延续，中华文明才得以传承至今。通过甲骨文或者商代铜器铭文的细心分析、研究、考定，对考古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独特地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三十世纪初中国古史四大发现展”现场



彭林(左四)在“第三届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上发言



文化传承